

How
Russia
Really
Works!

The Informal Practices that Shaped Post-Sov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

Alena V. Ledeneva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俄罗斯社会的潜规则

——后苏联时代政治与商业领域中的寻租行为

[英] 阿莉娜·V. 莱德尼娃 著 / 王学东 等译

俄罗斯社会的潜规则

——后苏联时代政治与商业领域中的寻租行为

[英] 阿莉娜·V. 莱德尼娃 著 王学东 等译

HOW
BUSINESS
WORKS?

Alena V. Ledeneva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朱天飏 执行主编/曹海军 刘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ow Russia Really Work: The Informal Practices that Shaped Post-Sov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 by Alena V. Ledeneva,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6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Beijing Sourcebook Agency.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6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社会的潜规则：后苏联时代政治与商业领域中的寻租行为 / (英) 莱德尼娃著；王学东等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0

书名原文:How Russia Really Works:The Informal Practices That Shaped Post-Sov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

ISBN 978-7-5463-0950-7

I. 俄… II. ①莱…②王… III. 政治 - 研究 - 俄罗斯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5575号

书 名：俄罗斯社会的潜规则：
后苏联时代政治与商业领域中的寻租行为
著 者：[英]阿莉娜·V.莱德尼娃
译 者：王学东 等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 划 编 辑：曹海军
责 任 编 辑：顾学云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20.25
版 次：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0950-7
定 价：34.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前 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2006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1965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的

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是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对国家概念清楚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审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注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动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经济学课上学习的所有“孩子”,他们是我在中国推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动力。

2007 年末

于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前 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 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石。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1780年、1880年,还是在1980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1780年生产服装提升到1880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1980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

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视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据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转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实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中文版前言

能够有机会把笔者对“寻租行为”的研究结果呈献给中国的读者，本人深感荣幸之至。中国的读者或许对“寻租行为”早已相当熟悉，因为笔者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俄罗斯人认为，俄国是一个盛行“潜规则”的国度。其实，从本质上讲，二者可谓殊途同归，都暗示着在正式制度的表层之下，“寻租行为”等潜规则的运行如暗流涌动，奔腾不息。

有关俄罗斯社会中“寻租行为”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有何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思索“寻租行为”如何影响中国进程的学者、研究者以及实践者，甚至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言，本书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本书中，笔者试图从一个新颖的角度，以俄罗斯为比较研究的个案，评估“寻租行为”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中国读者可以把本书所研究的“寻租行为”理解为类似于中国式的“拉关系”的行为。它指的是，在正式制度规则的背景下，人们设法规避、操纵或者利用规则的一系列惯用策略。寻租行为游走于正式规则与潜在规范之间，其模式自然会随着规则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可以说，这类行为既支撑着正式规则与潜在规范，同时又起到了颠覆的作用。

人们常常把“寻租行为”误解或者误读为“腐败行为”，其实不足为怪——对外界而言，寻租行为也好，腐败行为也罢，两者都是不透明的，都依附于人际关系和潜规则，并且都对现代化的进程构成了障碍。然

而,相比较而言,“寻租行为”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譬如,在供应短缺的时代,人们往往通过“寻租行为”来获得商品和服务,规避正式规则。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还是在俄罗斯当下的经济生活中,“拉关系”与“寻租”都扮演着充满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它们补偿了正式规则中存在的缺陷,使得既定的经济规则得以运行下去;另一方面,它们又破坏着既定规则。可以说,就处于改革时期的中国和俄罗斯而言,“寻租行为”绝不仅仅是个贬义词;在很多层面中,寻租行为还促进了改革的成功。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本书认为,寻租行为是社会体系中存在着结构性压力的表征。寻租行为所涉及的维度与效应依据其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分化:在中央计划经济之下,寻租行为能够堵塞国家分配体系存在的漏洞、弥补商品短缺效应,可以缓解计划调控对经济发展形成桎梏的意识形态的困境。然而,计划经济被取代之后,寻租行为的存在则反映了结构性压力与塑造力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寻租行为的功能发生了转变,从弥补压力转变为利用新系统的弱点,从而催生了公开性的腐败行为。就后者而言,寻租行为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压力的反弹,而是带有历史与文化烙印的个体行为的体现。

单从经济层面来看,寻租行为既可以被视为一种障碍,又可以看做是一种资源。寻租行为直指正式制度的缺陷与要害,因此,它可以作为辨识正式制度运行状况的指征。与此同时,寻租行为还辩证地说明了社会民众是如何应对制度运作而不断演化的。对寻租行为的比较研究与细微洞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治与经济机制的考察与透视。更为重要的是,寻租行为自我剖析了它自身的变化进程:俄罗斯后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寻租行为”似乎与西方社会的情形相类似,而中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关系行为”的运作则与其他儒家文化区域具有共通之处。上述趋势不仅演示了俄罗斯与中国各自在克服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缺陷的发展进程,而且展示了它们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个性化的进程。

研究“寻租行为”的确是个艰辛的工作：首先，寻租行为所具有的隐性特征使得评估与测量难以正常进行，笔者不得不诉诸定性研究这一研究路径。其次，数据收集也是相当棘手，因为研究寻租行为必须依靠内行人与知情者，依赖于他们阐述自身所作所为的意愿与能力。对各类寻租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表面类似的行为在不同的背景下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在社会处于急剧变迁的背景下——如俄罗斯那样——寻租行为就特别突出；但在增量式变迁的情形下，寻租行为的踪迹却难以寻觅。旁观者对寻租行为充满了误解，而知情者却认为寻租行为实在是寻常不过；本书的一个研究目的，就是为两者间的相互认知铺设一座桥梁，力图找寻一个新的视角，为探讨民主制度、媒体的自由度、行政管理的透明度、商业财政的内幕，以及司法体系的可信度等众多话题提供某种便利。

阿莉娜·V. 莱德尼娃

2008年6月于伦敦大学学院

致 谢

首先,我很感激所有的受访者,他们慷慨大度,让我分享了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清晰的洞察力。他们都是俄罗斯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行家里手,没有他们,这本书根本无从谈起。

我特别感谢英国学术研究机构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该研究机构为本研究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必要的田野调查提供了研究经费。我要感谢等阿奇叶·布朗、卡罗莱纳·汉弗莱、戴维·雷茵、威廉姆·米勒以及西奥多·谢宁诸位朋友,他们支持我的理念并支持我的申请。

我要感谢梯穆·考尔顿等在戴维斯中心工作的同事。2005年秋季我获得资助,成为哈佛大学政府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学者。正是在哈佛大学那样令人振奋的学术环境中,我才得以顺利完成这一研究项目。我还要感谢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他们在我学术休假期间接管我的工作,使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要感谢苏珊·罗斯—艾克尔曼和简诺斯·廓奈。2001到2002年,我参与了布达佩斯学院的匈牙利高级研究所的“诚实与信任”研究项目,他们给予我充足的时间与大力支持。

多少年来,许多人从各个方面对该项目给予了帮助。我特别感谢凯伦·珀瑟尔,她给予我众多的帮助,而且从头到尾参与此项研究。感谢我的挚友艾伦·达伦道夫、阿瑞娜·达夫多娃、弗拉基米尔·吉尔曼、弗莱莉·克里尤可夫、罗伯特·孟多查、比尔·汤普逊,以及瓦迪姆·弗尔科夫对于此项研究的贡献。

我的研究助手帮助我挖掘文献、整理图表以及跟踪影像资料,他们是:足立勇子、尼娜·费依、乔西·弗尔尼斯、安东尼·劳伦、尤里亚·石罗科娃和炽仁稻子。他们帮忙誊写访谈内容,寻找线索,并准备草稿。参与我的“寻租行为”课程的研究生们是促使我澄清观点、明晰结构的动力。

我必须提到那些在各个研究阶段从思想上给我影响的“启发式人物”:什艾拉·菲兹帕特里克、乔弗雷·霍斯金、阿那托利·兰兹曼、茵娜·雷夫金纳、查尔斯·梯利以及我的女儿玛利亚·莱德尼娃。特别感谢托尼·吉登斯,如果不是他的话,此项目根本不可能成形。

与罗德里克·布雷斯特怀特、查尔斯·格兰特、菲力·汉森、惕姆·兰克斯特、罗伯特·皮恩森以及乔治·施库普夫林等人的讨论使本人受益匪浅。

我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南希·莱斯和布鲁斯·格兰特,他们对此项目一直很热心,给予我积极的反馈。能够与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约翰·艾科尔曼、彼得·卫斯索科、加德斯·亚金斯以及文本编辑耶密·富勒一起合作,我感觉无比愉悦。

非常感激马拉·古尔曼美术馆的马拉·古尔曼允许我复制影像资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曾经在我以前的出版物中有所体现。其中,潜规则问题的首次提出是在欧洲改革中心(网址是 www.cer.org.uk)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里;“连环套”的谱系探讨出现在由艾维娜·玛克娃主编的《后共产主义欧洲的信任与民主转型》英国学院的汇编本第 123 卷;该书第四章的历史部分承蒙英国学会允许重印;而第 6 章是“俄罗斯地下金融”一文的修订版,原文出版在由简诺斯·廓奈波·罗斯斯坦和苏珊·罗斯—艾克尔曼主编的《在后社会主义转型中建构社会信任》(2004 年版)——承蒙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允许再版,特意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西伯利亚家族对我的影响。母亲谆谆教导我要永不言弃,要直面人生的挑战。本研究项目让我体验到了这一点。我的祖母米哈伊洛娃那种身处困苦但志存高远、衣食粗鄙但心灵高贵的生活态度,为我树立了人生的榜样。谨将此书献给她老人家。

导 论

苏维埃体制并不是计划经济。它原本有计划经济的意味,但生活在这片疆域上的人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寻求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策略,以抵制苏维埃体制所固有的过度集权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些策略包括非正式交换(或称隐性交易)、地区性与产业部门游说以及各类规避体制控制的行为。^① 同样地,后苏联时代的体制也几乎不是依照它所宣称的市场民主原则来运作的。与以往一样,寻租行为(即非正式的实践与惯例)通常被用来弥补制度的不足。如果要维持体制的正常运作,上述实践与惯例就显得尤为必要,但寻租行为同时体现了某种专门技巧,此类技巧让有能力的人得以操纵体制为其自身的利益服务。20世纪90年代,寻租行为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渗透到俄罗斯的各个领域,无所不在,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在拙作《俄罗斯的惠顾经济》(*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一书中,笔者认为“关系(Blat)”(即在供应短缺时代,运用人际关系网络以获得商品与服务、规避正式规则的行为)“在后苏联时代”正“日益丧失

^① 正如维拉·敦汉姆(Vera Dunham)在其著作《斯大林时代》中解释的那样:“互惠互利是斯大林式的官僚体制中危害性最小且最为有用的一个侧影,如果没有互惠互利这种人性的特点,经济生活将无法延续。事实上,互惠互利尽管不合法,但是贯穿于国民经济:它是‘关系’一词的苏联翻版”。(1976/1990,15)。约瑟夫·伯林勒(Joseph Berliner,1957)和克劳斯·麦勒特(Klaus Mehnert,1958/1962,87—89)也强调幕后推手对于计划经济的运作不可或缺。

其突出的重要性”。^① 现在看来,或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计划经济的政治与经济基础的变迁导致了“关系”的货币化(或称金钱化),导致了人际关系网络运作的重新定位,这一定位指向了一种新型的短缺——货币短缺。上述变化还滋生了一整套新型的寻租行为。在本书中,笔者力图分辨出后苏联时代背景下所衍生或重组的寻租行为。此类实践行为包括:政治领域中的“黑金公关(black PR)”、媒体行业中的“抹黑现象(kompromat)”、各个行业圈内的“连坐制(krugovaia poruka)”,以及商业领域与司法部门中的诡计谋略。这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弥补了后苏联社会秩序固有的缺陷,并有助于重塑一度为苏联时期的寻租行为所主宰的领域。笔者认为,正如“关系”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旁门左道的典范一样,上述后社会主义式的寻租行为则代表着后苏联时代俄国通行的潜规则。因此,它们是俄罗斯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

2 INDEM^② 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拉关系、走后门等钻制度漏洞的旁门左道延续至今,导致当前私人贿赂金额的年度总数达到了 280 亿美元。^③ 然而,“家庭”型腐败(以区别于商业贿赂)只占整个腐败市场的 10%。俄罗斯 90% 左右的贿赂是商业型贿赂,通过贿赂,商人们可以获得出口许可证和配额、国家预算交易、税收中转、关税、私有化交易及联邦预算的服务性债务。^④ 一位具有外交背景的受访

① 参见莱德尼娃(1998,175 页)。关系(blak)一般是指拉拢、运用各种人际网络以获得某种影响与利益的现象。大多数俄语词典沿用了“关系”一词在俄国革命之前的意思,指的是某种犯罪行为,尽管该词语通常用来指涉并不严重的犯罪,比如小偷小摸等行为。在方言中,“拉关系”意思就是“找熟人”,也就意味着想通过渠道获得某些好处、安排某些事情。

② 这指的是“社会型贿赂”现象,包括卫生、教育体系的贿赂问题。参见:“Spor o vziatkh”, <http://www.vedomosti.ru>, 2003 年 6 月 18 日。

③ 参见 <http://www.indem.ru> 以及 2002 年 5 月 22 日 Vedomosti “\$ 38 mlrd na lapu” INDEM 有关数据, <http://dlib.eastview.com/sources/article.jsp?id=4142985>。

④ 参见 <http://www.indem.ru> 以及 2002 年 5 月 22 日 Vedomosti “\$ 38 mlrd na lapu” INDEM 有关数据, <http://dlib.eastview.com/sources/article.jsp?id=4142985>。

者道出了私有化的蹊跷内幕：

[20世纪90年代]尽管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最根本的模式还是苏联方式——由国家来定量配给、分配物资。过去由国家来定量配给所有物资，包括向党员干部分配别墅之类的实物。现在，风险增加了：可能性的提高伴随着风险的增加，但物资分配依然遵循上级部门指定这一逻辑。很少有例外。同时，不应该过高估计苏联定量配给制度的后遗症。80年代末期开始做生意的新一代的商人问题更大，他们一般都是从20岁出头就开始做生意，（一般是以违法犯罪方式——AL），现在不过30多岁。他们根本没有所谓秩序的观念——（相比之下），苏维埃时期的那代人更有制度感，尽管他们自己也违反规则。[3.16]*

通过研究寻租行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力图阐释的是，后苏联时代前10年间政治制度与经济实践中鲜为人知的一幕，以及其内部固有的矛盾。例如，寻租行为与实物交易、财政谋划、欺诈性合同等手段相结合促进了商业发展，但依赖于反市场类型的结盟；它们促进自由竞争又破坏自由竞争。寻租行为迅速适应了法律的变迁并利用法律制度，同时又为法治的确立设立了障碍。寻租行为在使特定集团受益的同时，也迎合了经济领域的更为广泛的需求，实际上为国家所默许。换句话说，对俄罗斯经济、俄国政府以及俄罗斯民众而言，寻租行为既是一个障碍，也是一种资源。

某些行为，比如记双账(double book keeping)和行贿受贿，似乎一直是俄罗斯社会的保留曲目，尽管其形式会不断变幻以适应市场的挑战，当下的方式只不过是继承与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寻租行为植根于俄罗斯的风俗习惯，延续至今并以互惠方式进入经济生活当中，制约

* 方括号中的数字按照问题排列，参见附录五中受访者名单。